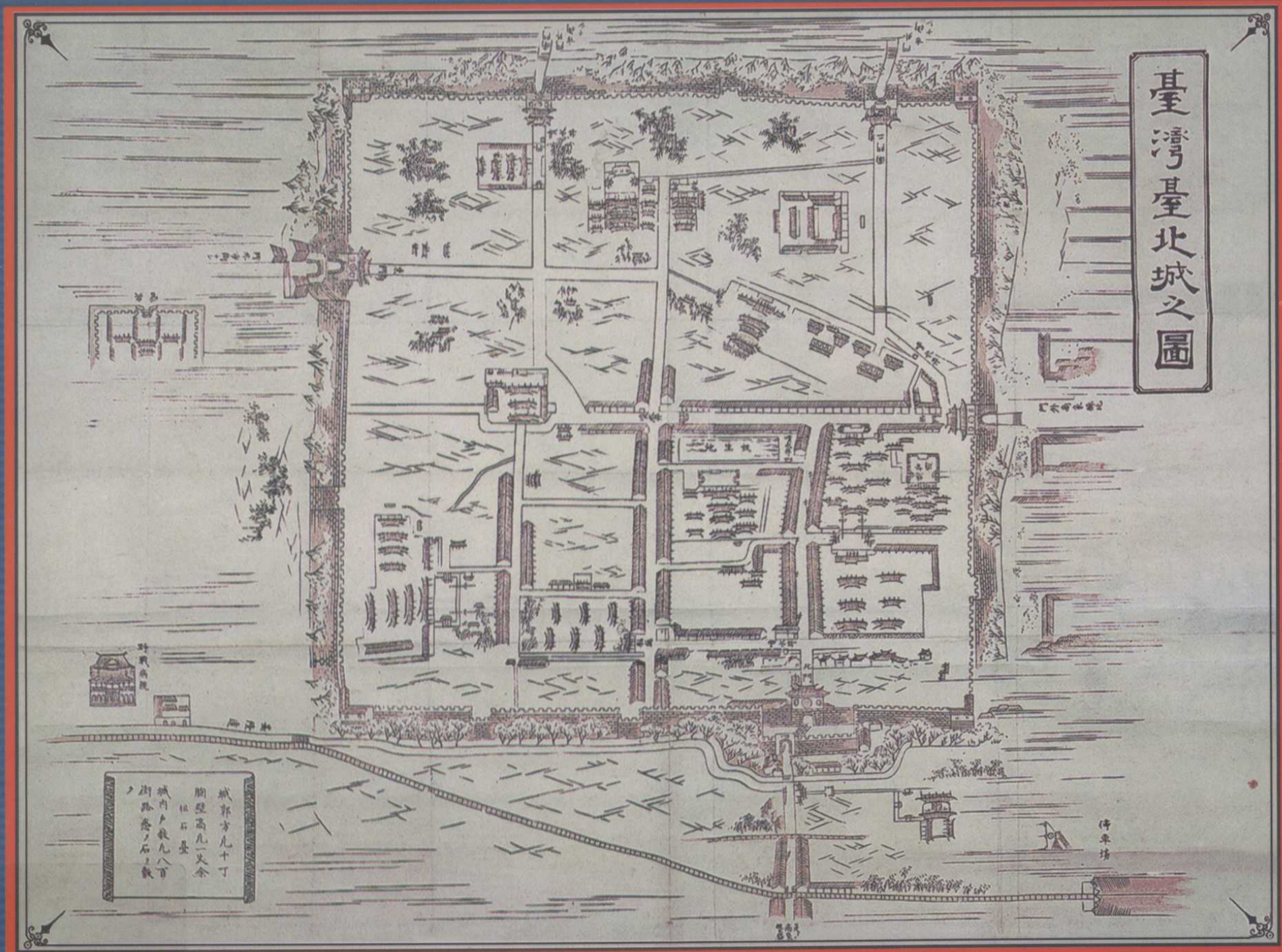


臺北市誌

陳正祥 著



K275.01
2008/2

港台書

臺北市誌

陳正祥 著



臺北南天書局出版

增訂版序言

從1947年冬天到1964年春天，我住臺北市，在臺灣大學教書。這十七年對我很重要，中間發生過頗多具有特殊意義的事，包括一次用誠懇對話化解幾個落難青年生命的危機；在一個人的學術生涯中，能有幾個十七年呢？

我離開臺北後一直沒有回去過，時間已長達32年，曾引起很多人的議論。有謠傳說我已北非考察沙漠灌溉中墜機死亡，害得我的朋友打電話到香港求證，接電話的就是我本人。離奇的事還很多，目前尚不宜全部發表。也有人邀請我訪問或開會的，包括王雲五前輩叫我回去領什麼優異研究獎，張其昀前輩要我回去參加中央大學復校委員會會議等等，但我都走不開，因為實在很忙；同時對這些事已失掉興趣，到現在還是如此。接着更發生過幾件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我也都謝絕了。我只想過隱居生活，但求一個安靜的心，讓我默默地作一些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研究，寫若干為國際學術界接受的著作。部分成果已經印行，部分沒有；用外文發表的皆屬提要。如果對我的研究和著述有興趣，可參閱我七十歲生日時，一批老學生給我所編1932—1992年六十年間的著作目錄。（南天書局出版《臺灣地誌》下冊，頁1320—60），其中約有十多種和臺北市有關，特別是《臺北市誌》。

既然決定回來看看了，總得帶些禮物。稍早我已複製了一幅中國古地圖，那是清代初期康熙年間完成的《皇朝輿地全圖》法文簡縮版，印製於1730年，具有頗高水平。因事先未報知清廷，恐懼中國皇帝降罪，不敢公開發行，故坊間遺存甚少。我1959年5月應邀從臺北赴西柏林參加國際紀念現代地理學之父洪包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逝世一百週年大會，會後被安排到西歐各著名地理學中心參觀和講學，經過Amsterdam時發現此圖，遂以高價購回。在書房懸掛三十多年之後，印刷了分贈朋友共同欣賞。但覺得缺乏親切感，因為它並非我的作品。總想在自己的著作中，選出比較適合的一種。

剛巧兩個多月前，臺北出版界怪傑、南天書局總經理魏德文君，建議重印我的《臺北市誌》；兩件事配合在一起，我寫信給魏總經理表示同意。接着是他到香港來了，當面談妥了再版的事。近年我同魏德文君在香港會面多次，每次總是一談三天。

原始的《臺北市誌》是1957年出版的，列為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79號，早一年出版的The City of Taipei，則列為同一研究報告的71號。當時全世界注意臺灣，因此我對臺灣所作的研究也受到了世人注意，這對我的學術生涯有頗大影響。美國地理學會的代表刊物Geographical Review，被視為國際權威刊物的，1951年的卷41期3，刊載了我的Land Utilization in Formosa的長文（438—56頁，附有33幅地圖）；1953年的卷43期1，又刊出了The Pescadores，77—88頁，附地圖9幅。（澎湖群島一文中，我插了一幅婦女代牛犁田

的照片，還引起了某方的特別關注，有人找上門來。）自此直到1959年，幾乎每期都有關於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和臺灣的訊息，而1959年十月號，更用三頁篇幅報導了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報告 (Research Report of Fu-Min Geographic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575-77)；此前該刊從未作過類似的報導。同年七月號，美國首席地理學家C.D. Harris（曾任國際地理學會總幹事，長期主持芝加哥大學地理系）一篇討論世界新進地理學出版物中，在第399頁中國部分就只提到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出版的Research Reports, Geography and Industries和Urban and Rural Survey in Taiwan；關於第三部分，他在另一論著中，提到了我所作的臺北市和基隆市的精密調查工作，包括市區土地價格以及建築物的層數和逐層利用等。並指出其他亞洲的城市，包括日本的，從未作過類似的精密調查和研究。

其實我一到臺北，就覺得這個城市頗有特色。但日本人只留下一些統計資料，沒有留下任何有關的著作。連最基本的人口統計資料，還是想盡方法，通過學生蔡曉畊等人，向曾在日據時期當過警察，光復後躲藏起來的人物高價收買的；除現金外還另加香煙。若無這番努力，後人就不可能看到當時臺北市的人口分佈情況。

作成了最基本的人口地圖，我在1952年首先出版了《臺北都市地理》，列為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27號，總計附有地圖19幅。

我的研究室裡經常掛着幾幅臺北市彩色地圖，來訪的外國朋友看見了，總勸我用英文寫出來向全世界報導。於是我在1957年出版《臺北市誌》之前，先出版了The City of Taipei，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的主要地理刊物，包括紐約的Geographical Review，Montreal的Revue Canadienne de Geographie和東京的《地理學評論》都先後出現了評介。其中一篇叫作Asian Cities的，特別提到The City of Taipei一書。該文作者應該是熟人，因為他知道我很忙，但仍批評文字部分太簡略，認為書中所附的地圖都值得詳加解譯。我自己也有同感。但他不明瞭就在這個時候，我正在世界農業氣象委員會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等的函電交加下，忙碌著編製《中國蝗蟲災害分佈圖》，無法分給臺北一書較多的時間，覺得無可奈何而深抱歉疚。（參閱《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值》一書，香港中文大學首任地理學講座教授就職演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1965年出版。）

不知是因為時代責任感或受到基隆市先有城市規劃的刺激，臺北市政府主動找敷明研究所合作研究臺北城市設計。以奇擊得手當選市長的高玉樹先生同我有幾次見面，他留給我的記憶是手心很燙；第一次握手以為他患感冒，第二次會見握手後，就確認此人有點奇怪了。我走遍全世界，同各色人等握過手，包括印第斯山高處Titicaca湖畔飼養駝羊的純種印第安人；分佈祁連山深處，我推測混有羅馬人血統的裕固族（參閱南天出版《西北考察記》第47節），卻只有高某的手心是燙的。他對城市規劃似無多大興趣，只希望我對鐵路改線提供意見（基隆市長謝貫一對城市改造有較大興趣，來臺北找我超過十次，我去基隆考察調查，多數由他親自陪同，要求告許他如何利用地下空間；部分成果編入了《基隆市志》）。我要求高市長提供大縮尺地圖，工作完成時會交給他一套可作臺北都市規劃依據的地圖，結果我們

編成了一百多幅地圖，主要是靠孫得雄弟的努力，也是由他繳交臺北市政府的。（這些地圖後來竟被交給了幾個德國青年，要求他們繼續研究。隔年老友艾伯華教授——原籍德國的加州大學教授）告訴我，有兩個德國人就利用這些圖去寫了博士論文）。

工務局局長同我接觸較多，後來彼此熟悉了，順利問起臺北市找我的原委。他才說出原是奉命向美國要求派遣專家的，美方回說我已作過很好的調查研究，應就近請我們繼續作下去。這有可能是得 *The City of Taipei* 一書之賜。那個時候，臺灣幾乎事事依靠美援。

我離臺北後當過臺北市市長的，有我的兩個老學生；其中一人是新近被我的“同宗”陳水扁拉下馬的。我想陳水扁市長的手心也會是燙的。這樣看起來，我同臺北市的關係應該可算密切了。我一生中就只在杭州、臺北、香港三處各住過十年以上，而且只寫過《臺北市誌》。此間有人請求我寫一冊《香港地誌》紀念九七香港回歸，但因事忙加以婉拒。

我對臺灣確實作了不少調查研究，但不為臺灣人民所知，原因是頗複雜的，可我個人也要負一部分責任。當時那個年代，樣樣要保密，地理著作份屬敏感；爲了減少麻煩，工作要靜靜地進行，出版品不要在當地流通。敷明研究所的出版品，一開始就限於贈送，寄贈海外主要有關研究機構和圖書館，交換我們本身所需的研究資料。我們沒有太多錢買書，現有爲數約達 15 萬冊的圖書大都靠交換得來。當時臺灣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我的著作全部寄往海外，比較笨重的幾種，例如《臺灣地誌》，是叫日本大使館和美國新聞處派車帶人前來領取。因此臺灣除了少數助理人員外，別處找不到《臺北市誌》之類的出版品。於是南天書局有興趣重印此書，將其重新介紹給臺灣讀者。但在時間上已遲了四十年。

甚至連敷明研究所也鮮爲臺灣人民所知，因爲我們只知道努力工作，絕不作宣傳。其實它早已被選爲國際地理學會的 *Official Agencies* 之一，照顧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地理研究機構。（見國際地理學會官方出版物 *Orbis Geographicus*, 1960, 第 197 頁有專門介紹）

較早在 1993 年，南天書局已重印了《臺灣地誌》，這完全因爲該書局負責人魏德文先生知道此書的重要。老學生孫得雄博士迅速來信，說爲該書能夠再版且印刷精美而高興，連忙買了四套分贈朋友。這使我想起李春桂，她在京都大學拜我爲師後，曾抱了珍藏的《臺灣地誌》要求我題字留念，說這部書是臺灣的寶貝，每個臺灣人都應該看，不限於學地理的。不料十多年之後，臺北優異刊物《天下》的編輯蕭錦綿女士，來信也說《臺灣地誌》是臺灣的寶貝，看到了極高興，一口氣買了三套。該書《增訂版序》第五頁，提到有人寫了「臺灣地誌經過此番修訂，必然會使這顆文化明珠更燦爛，永遠流傳人間。」接着是德文先生八月十三日的來信「臺灣地誌剩書可供應到年底，可望明年初再版。」此書定價不菲，而有這麼多人喜愛它、買它、看它，把它珍藏起來，似爲頗不尋常的文化訊息，這說明臺灣的文化良知和熱情，遠遠高出中國大陸和香港！這不但對南天書局是一種鼓勵，連帶催促了《臺北市誌》的再生，構成學術出版的良性循環，對我個人也是一項很好的安慰。

我的愛好著述和出版，應屬出於天性和家庭背景而與謀生完全無關。我所寫的，都是我所愛好的。當我發覺自己在臺北居住快滿十年時，立即決定要寫這本書作爲紀念。此書係

1957年5月出版，我7月應日本學術會議（國家科學院）之邀去東京參加國際地理學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首次在亞洲舉行的區域會議。那時日本很窮，只邀請了11個海外學者，我是其中之一。日本為爭取國際好感和同情，全力要辦好這次開頭的國際會議，接待極為周到。在首相府招待會中，我碰到曾在臺北帝國大學作研究工作，回國後轉任東北大學地理研究所所長，稍後出任日本地理學會會長的富田芳郎；我贈送一冊《臺北市誌》，他歡天喜地，當場在地圖上指出他在臺北時住在那裡。日本教授中在臺北住過的不少，他們都想得到一本《臺北市誌》；秋後回到臺北，我都按址分別寄贈，因而結交了更多的日本朋友。於是繼西村嘉助等人在《地理學評論》所發表有關《臺灣土地利用》的書評後；紛紛出現了關於《臺北市誌》的書評。我個人也收到一些祝賀的信和贈書，學術地位原來是用心血累積起來的。

德文先生要重印此書，最吸引他的應該是地圖，因為他對地圖賦有特殊的興趣。事實上全書48幅地圖都是創作；通過很大的勤力，給臺北市留下了難得的記錄。我在本書初版的自序中便說過：「我之所以要在艱苦環境中作都市調查（因此類工作屬於敏感，易招嫌忌），是想使臺灣的都市留下若干地理記錄；因為都市變遷快，此項記錄尤為重要。我在臺北已住滿十年，如果不能作一點有關臺北市的研究，顯然對不起後一代的地理學家。」最受國際地理學界讚揚中，也正是這些地圖，因為過去從事都市調查研究的，沒有人願意付出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而此等摺圖的印製和裝訂，恐怕還要給南天書局帶來一些麻煩。

《臺北市誌》所附的照片，原有者幾乎皆為我親自拍攝。我初到臺北，常帶愛妻四處攝影，在淡水河邊的古老陋巷中進進出出，不亦樂乎？每拍一幅，立青就記錄拍攝的時間和地點，便利我日後書寫說明。她愛好照片，也學習攝影；我在臺灣十七年所拍照片都由她保存，當德文先生建議重印此書，我就寫信告訴她，她很快便把一幅西門古城樓的彩色照片找出寄來了。據說只有這一幅較好，其餘絕大多數都有霉爛。我還清楚記得那天“上街”拍攝古城樓，也是她陪我去的。幾乎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舊事了！

書末所增附的照片和地圖，則全靠德文先生的協助。德文先生的愛好地圖，似已入迷。本書封面所採用的古圖，也是他特地從東京高價購買來的，特此申謝。

陳 正 祥

1996年4月15日香港

序 言

人口的增加與產業的發展，使都市紛紛興起。各國都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正在不斷提高；而都市地理 (Urban Geography) 的研究，亦因此漸能受人注意。

都市地理的研究為都市設計 (City Planning) 的基本參考。本研究所的區域設計組與人口研究組，計劃在五年之內，實地調查臺灣所有的都市，並加以澈底的研究。此一研究報告，便是這個計劃的成果之一；惟目前因限於印刷費用，所出報告皆屬提要性質。此一報告的英文本已於去年十月出版，列為本研究所研究報告第七十一號，甚受歐美地理學界所歡迎。今再將其中文本印行，列為研究報告第七十九號。中文本與英文本，內容稍有不同。

我們之所以在艱苦環境中作都市調查，一則要使臺灣的都市留下若干地理記錄；因為都市的變遷較快，地理記錄尤為迫切而重要。我在臺北市已住滿十年，如果不能作一點有關臺北市的研究，顯然對不起後一代的地理學家。二則甚願趁此機會，訓練少數幾個可以造就的地理學人才；使現代的地理學不至於在臺灣絕種。真正的優秀地理學家，祇有專心努力學習，在不斷追隨導師的研究工作中產生，並無其他的隱蔽門路或捷徑。

此時此地而研究地理，所受限制極嚴，無謂的麻煩也很多。日據時期統計資料的散失以及基本地圖的缺乏，更增加了工作的困難。譬如本書所用光復當年的臺北市町別人口數，便是經過多方拜託；化了頗為可觀的舊臺幣，又受了不少的冤氣，才從一個退職的日據時期警察手裏取得；目的只是為了繪製第16頁與17頁的三幅地圖。地圖創作之難，於此多一明證。照片常能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在新近的地理學著作中應用漸多。本書所插的照片，除極少數幾張外，皆為著者親自攝取。為了拍攝圓環的全景，有一次誤踏偷工減料的水泥欄干，幾乎從五層樓頂跌下。拍照、填圖以及統計資料的利用，皆不能隨心所欲；故全書內容，仍不免有若干欠缺。

人類的現實生活，愈來愈見忙碌，讀書的時間越來越少。長篇的地理學著作，只好擺在書架上作為參考資料。如果要讀者一次看完，則文字必須緊縮，並應盡量用照片與地圖來代替文字。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不可避免的；同時也不僅限于地理學的著作。就本書說，文字、照片與地圖，大約各佔三分之一的篇幅。

本書原始資料的整理統計以及地圖的繪製，本研究所經濟地理組研究生兼助理孫得雄君協助最多；實地的調查與填圖工作，則多賴區域設計組准研究生姜道章君的努力。此外臺北市政府地政科長古廷正先生，也很熱心的給我許多便利，皆極令人感激；特此提及，聊申謝忱。

正祥自序於臺灣大學，1957年3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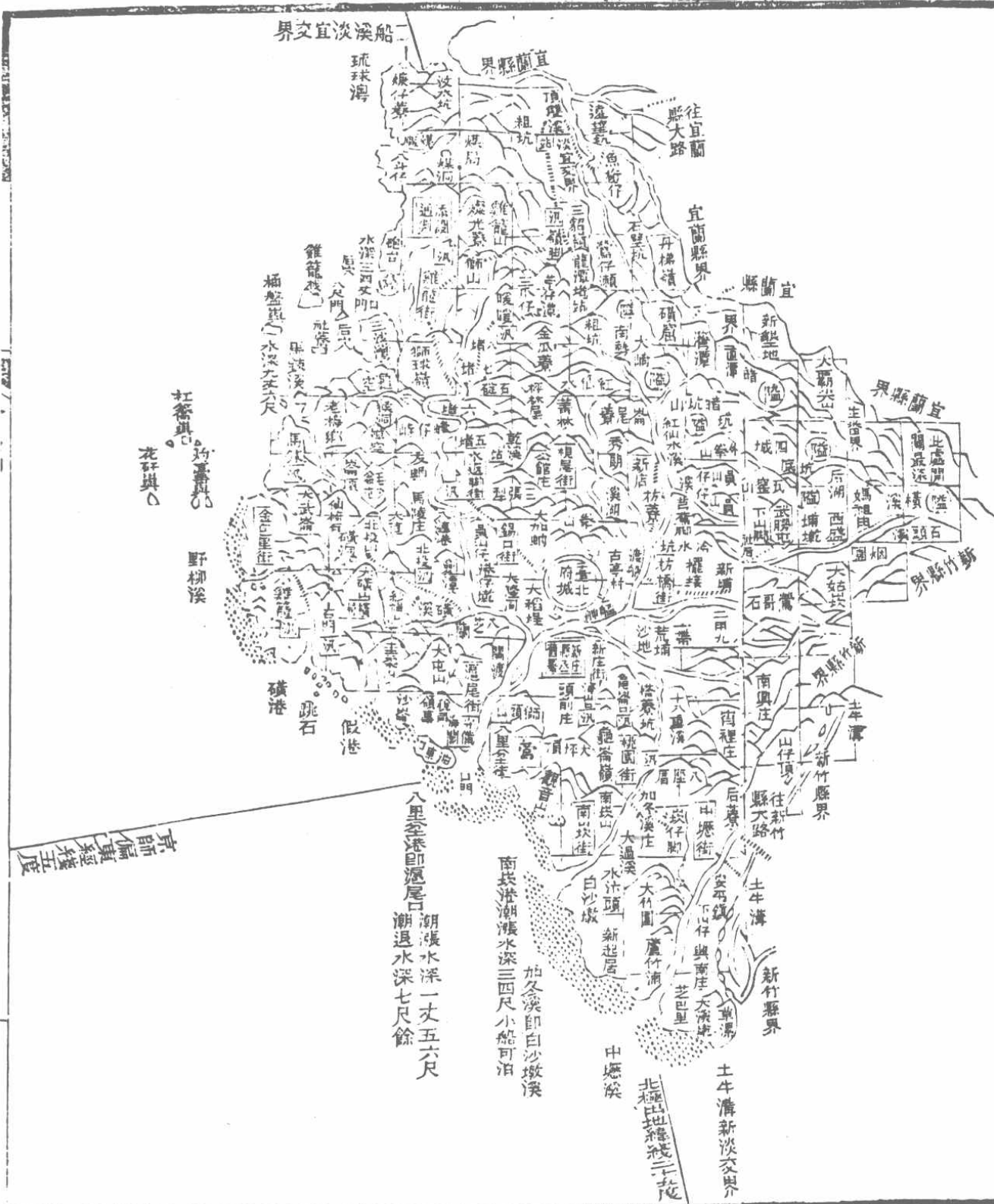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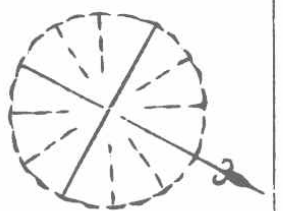
臺北府淡水縣分圖六

每方 格準作地平十里

衙署从□ 塘汛从□ 番屯从○
營哨从○ 隘寮从○ 路徑从≡

向方盤羅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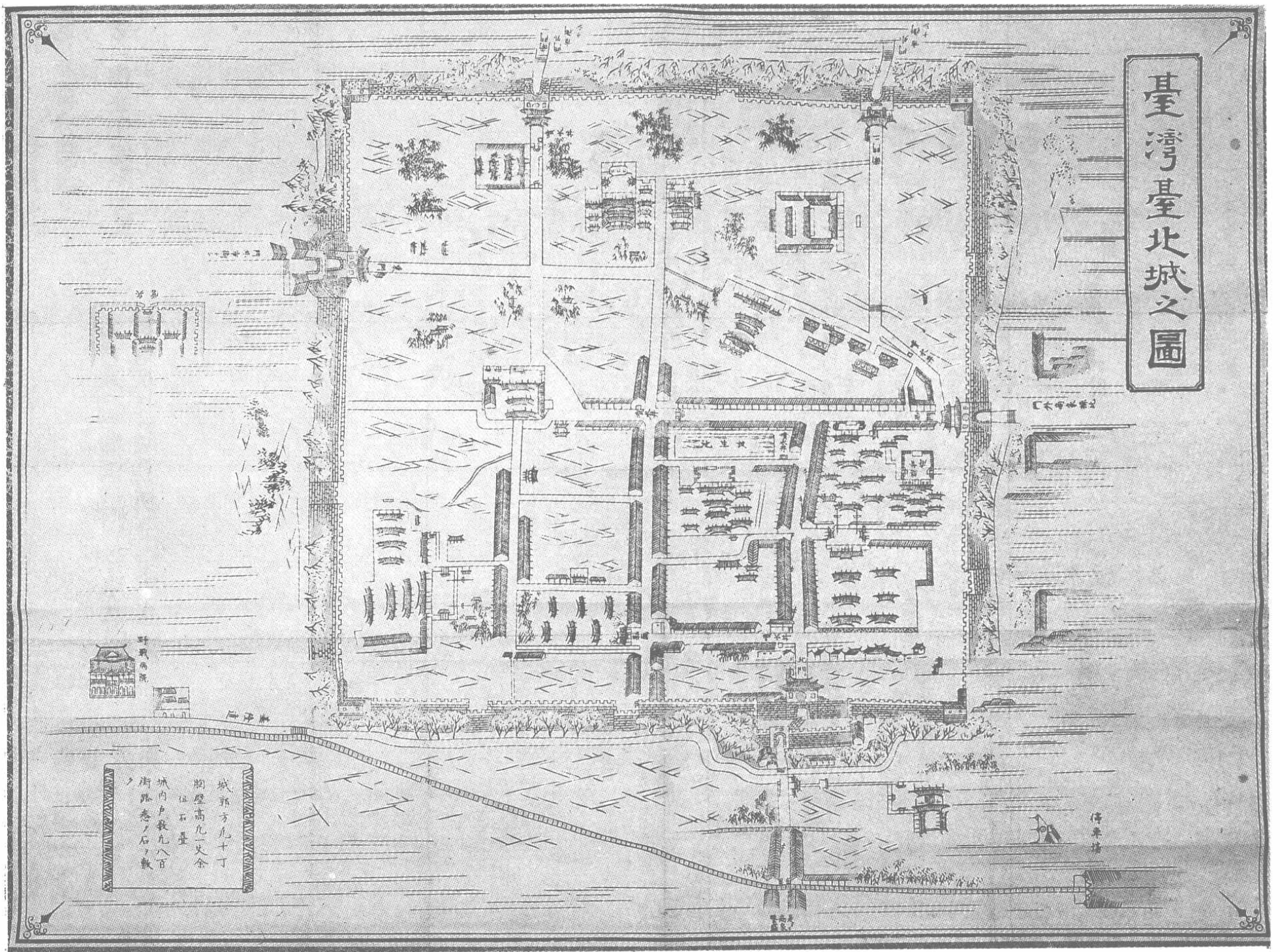


臺北府淡水縣分圖

清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建省之前的清光緒年間臺灣仍隸屬於福建省，其行政區劃為二府八縣四廳，有(一)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恒春縣、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二)臺北府：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時沈葆楨為主政臺灣欽差大臣。

清光緒年間，適值海疆多事，朝廷遂有開山撫番之政令，派夏獻綸(福建人)備兵來臺，任大夫布政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按察使銜、提督學政等職。遞歲周巡臺之前山(今西部地帶)南北，欲將各地詳悉為圖，因命余龍周歷各屬，經年餘後創之為圖。而後山則採用嘉應王君熊彪之稿，又屬閩縣王廣文、元釋為之纂校，後由夏氏復參酌審定，並於光緒五年(1879)刊行『臺灣輿圖(並說)』計十二幅：全臺前後山小總圖、臺灣縣圖、鳳山縣圖、嘉義縣圖、彰化縣圖、新竹縣圖、淡水縣圖、宜蘭縣圖、恒春縣圖、澎湖廳圖、彰化縣埔里六社圖、後山總圖各一，並附有解說等文。

本圖即為其十二幅之一的『臺北府淡水縣分圖』，係採用經緯度三角測量法及計里畫方法，圖版中每一方格為十里：北至花矸嶼南至新竹縣界，東至宜蘭縣界，西至沿海岸地區。地名大多一直沿用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間，堪稱為清代統治期間較為精確與詳盡之地圖。(魏德文解題)



臺灣臺北城之圖

臺北盆地漢人的入墾，早在十八世紀初期，從滬尾（淡水），經干豆門（關渡）、唎里岸（石碑），至大佳臘（艋舺，今萬華）。艋舺成爲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與漢人交易之處，形成臺北最早的商貿中心。十九世紀中葉後，尤其是咸豐十年（1860）淡水開港後，北部有稻米、茶、樟腦、木材、煤、大青染料及硫磺等產物的出口，利用淡水河之三支系爲船運之河道，由於大稻埕邊的淡水河畔水深，便於商船停靠，於是大稻埕商行、茶館，以及洋商雲集，漸漸取代了艋舺地位。

同治末年臺灣有一府、四縣、三廳，臺北隸屬淡水廳。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奏准將臺灣設爲二府：臺灣府、臺北府。臺灣府（轄管彰化縣及以南地區），臺北府（大甲溪以北區）設有新竹、淡水、宜蘭三縣及基隆廳。光緒元一四年（1875—1878）間，臺北府仍以淡水廳署（設新竹）爲府署。清政府因府

城的設立，規劃興建臺北城於光緒五年(1879)開始動工，十年後(1884)告成。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始建省。臺北成爲省的政治、文化、經濟的核心。臺灣北部的日益繁榮，發展迅速，凌駕南部而成爲臺灣的中樞地。

建城之始，由臺北知府陳星聚召集富豪巨商、士紳分配捐款。城郭方十丁(一千五百丈)，壁高一丈餘，且用石壘積而成，街路則以石板鋪成。城有五座門：景福門(東門)、寶成門(西門)、麗正門(大南門)、重熙門(小南門，通往板橋爲林本源捐資監造)，承恩門(北門)。建城經費龐大，紳民不堪負荷，相互推辭，歷經阻撓牽延，遲遲前後七年才告完工。

『臺灣臺北城之圖』南門進入左側爲文廟(今北一女校址)、武廟(位司法院)，天后宮(位今二二八公園內)，東門外：兵營(位東門國小附近)爲日軍三部隊，維護總督府安全。兵營下方野戰病院(約來來飯店附近)，係日治臺後新設。再往北(今善導寺、警政署附近)有軍法處，圖左下外的清代地名謂三板橋，爲今十四、十五號公園，原清朝末即爲漢人墳場，日治後爲日人的墓地。進東門往北之下方建築係淡水考棚。進北門延噴水井左方，係清朝的臺北府署，日治爲臺北縣廳(約今開封街與重慶南路之間的第一銀行及臺灣商務印書館附近)，入北門前右側爲清代巡撫與布政使司衙門，日治初期則謂總督府(位於今中山堂一帶)。五座城門除西門外往艋舺商家櫛比及北門通往大稻埕商家繁盛外，城外均無市街，城內住戶八百家。北門外右側停車場即是臺北火車站(約今鄭州路)，車站附近有製造局(今中興醫院附近)，生產鐵道用相關機器，而今九號水門附近設有海關，係淡水分支機構。鐵道從基隆至臺北一大橋頭(約今南京西路通過淡水河對岸)一海山口(新莊)一打藔坑(迴龍)一龜崙嶺(龜山)一桃仔園(桃園)，係光緒十三年(1887)劉銘傳所鋪舊道。進西門進東右側爲劉銘傳所規劃商家，每戶一丈八(約衡陽路、沅陵街一帶)，進西門右側，曾在清代有名的淡水館(約今遠東百貨公司及憲兵隊附近)，爲文人士紳文藝聚會與娛樂場地。

明治34年(1901)年自臺北—萬華—樹林—鶯歌石—桃園新線通車，此線即現今之鐵道位置，比原舊道南移至近城壁外側。明治四十四年(1911)日人將城牆拆除闢爲三線道路(中間大道，二側慢車、人行道(即如今中山南路)，西門拆除後，日人於心不安，後藤新平下令而保住其他四座城門，其中目前僅存北城門上的屋頂建築係原來的南方式樣建築，而其他三座屋頂係光復後國民政府改爲北方式樣建築。建城之始，廢城之末，歷時僅二二載，而天后宮、文廟、武廟及總督府無一幸免拆除命運。

此城圖爲木板雕刻印刷，着有淡彩，圖幅66.2 × 50.0公分，推定年代應刻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治之後至明治三十四年(1901)之前，南天書局藏。

(魏德文解題)



軍校尉

縣尉署

縣丞署
縣尉署
縣尉署

縣尉署

縣尉署

舊東門

縣尉署

舊東門

北臺

臺

府北臺
門南府舊

縣丞署

縣尉署

縣尉署

舊東門

舊東門



臺北市誌

陳正祥

臺北市的人口，在 1955 年年底超過了七十萬。至此，臺北市不僅為臺灣第一大都市，並且已成為東南亞主要都市之一⁽¹⁾。

臺北市為臺灣省的省會所在，也是全省經濟與文化教育的中心。自從 1920 年正式設市以來，三十餘年之間，市街範圍逐漸擴大，市區人口不斷激增。1920 年時，全市之建築用地不過 677 公頃，1955 年乃增至 1,792 公頃，擴張了 1.6 倍。1920 年全市人口尚僅 164,329 人，1955 年則達 704,124 人，更增加了 3.3 倍之多。

一、位置與環境

臺北市位於臺北盆地的中央，在淡水河東岸；介乎淡水河二大支流——新店溪與基隆河的下流之間⁽²⁾。臺北市最初的形成，與淡水河及其支流的水運有密切關係。

淡水河、新店溪與基隆河，替臺北盆地開了四個缺口，其餘四周皆有丘陵環繞，若干山崗且直逼市區。市區東南角的紫頭埤山，海拔 606 公尺，為全市的最高點。北邊的劍潭山，最高點為 153 公尺。動物園所在的圓山，高不到 26 公尺。市區內部，完全是一片平原，海拔平均約為 7 公尺，地勢大致從東南向西北緩斜。

市區東西的最大距離約為 11 公里，南北的最大距離約為 9.4 公里，全部土地面積為 66.99 方公里；在行政上劃分為大同、延平、建成、中山、城中、龍山、雙園、古亭、大安與松山等十區。真正的市街 (built-up) 部分，偏在市區的西南部；其面積約為 17 方公里，僅佔全市土地總面積 25%。其餘廣大地區，多屬農田與山林；農田之中，水田的面積廣達 20 方公里，約佔全市土地總面積 30%。

臺北市的氣候，暖熱多雨。全年之中，有八個月的平均氣溫皆超過 20°C；最冷的二月份，平均氣溫尚得 15°C。從四月份起，平均氣溫便高出 20°C，如此可一直延續到十一月。惟臺北的三四兩月，天氣極不穩定；涼暖突變，容易傷風。例如 1956 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一時，氣溫曾高至 31.6°C，但傍晚氣溫急降，在九時到十時之間，氣溫相差 4.5°C；十八日傍晚與十九日傍晚七時之間，氣溫相差 15.2°C；到二十日凌晨，氣溫續降至 11.1°C。在短短三十六小時之間，氣溫竟急降 20°C，無怪傷風者比比皆是。

註 1：除我國大陸沿海外，整個東南亞僅香港、曼谷、新加坡、雅加達、西貢、仰光與馬尼刺等七處之人口超過臺北。

註 2：淡水河在臺北市區內的一段，長度為 4.47 公里；新店溪在市區內的一段，長 11.89 公里；基隆河在市區內的一段，長 8.4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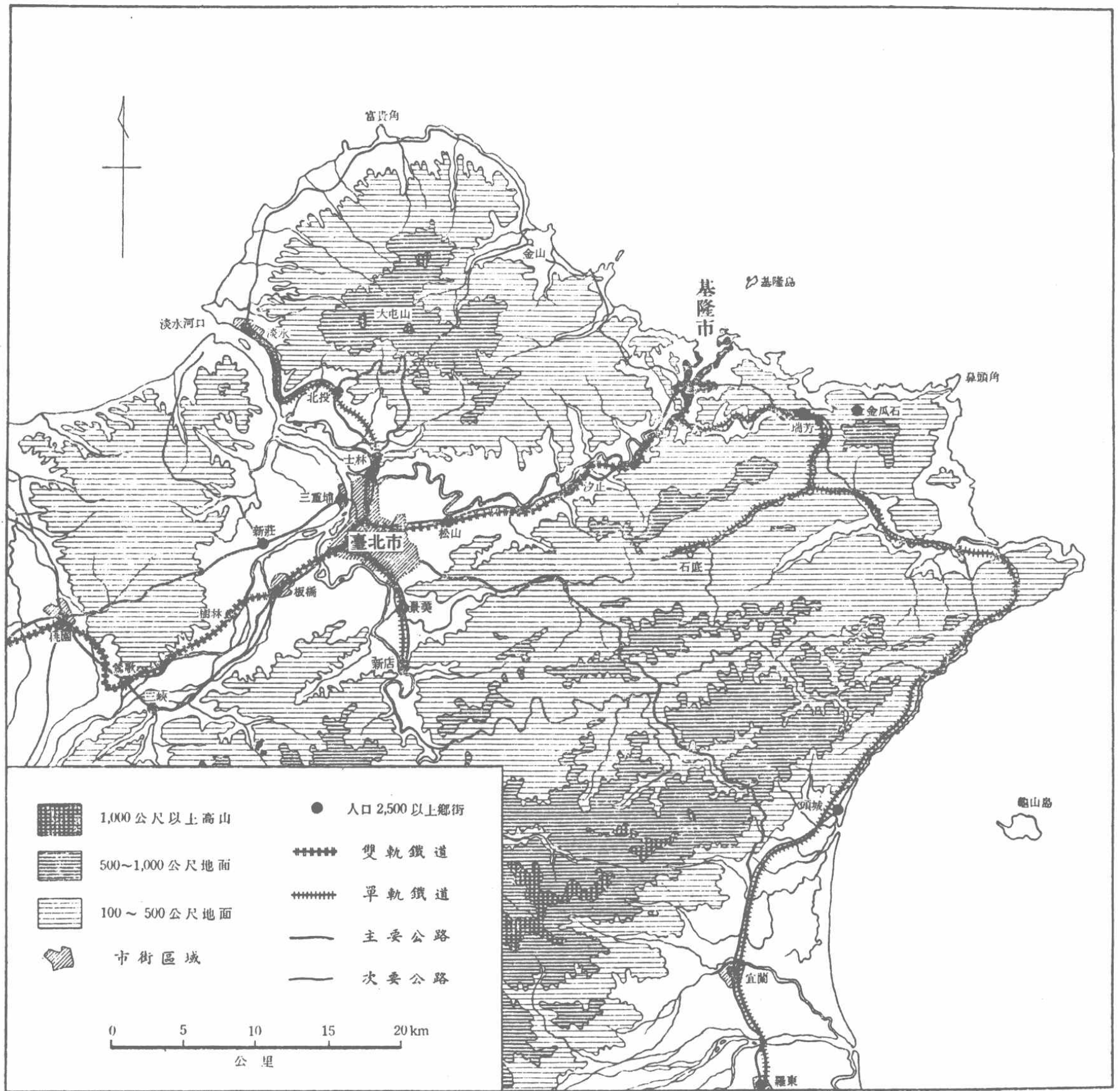


圖 1: 臺北市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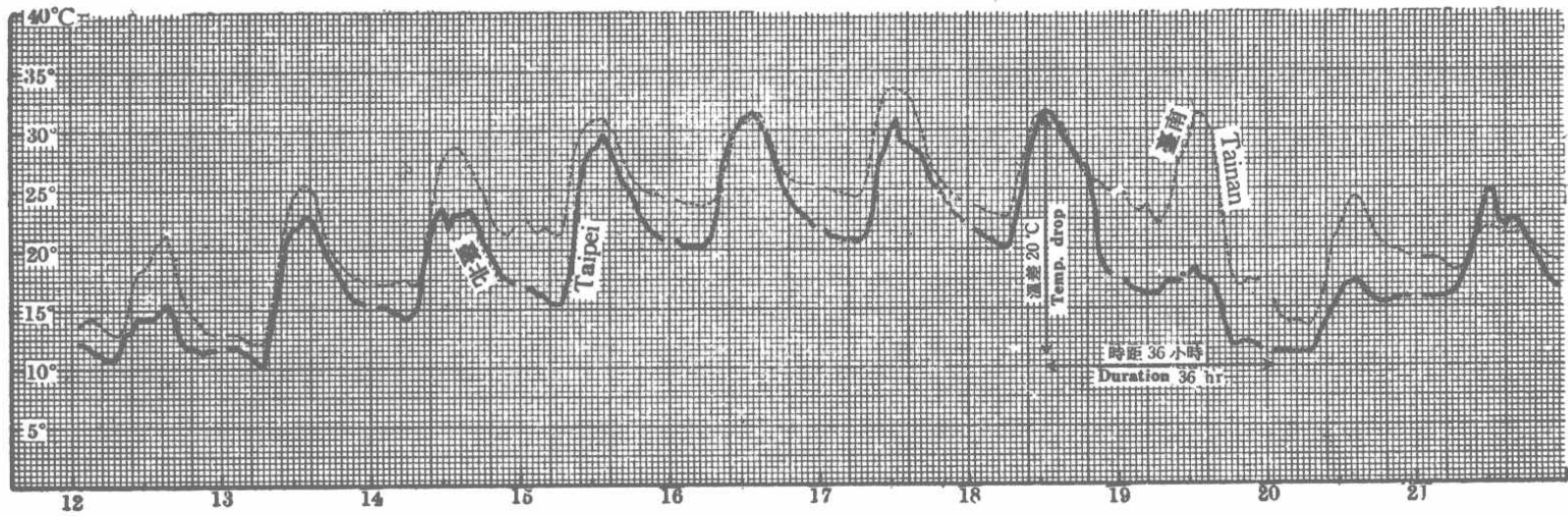


圖 2：臺北市 1956 年 3 月 18~20 日氣溫之急降

我人設以每候平均氣溫在 22°C 以上者為夏，則臺北市的夏季開始於四月第五候，終止於十一月第一候，夏季的長度達 200 天之久。臺北市在夏期半年，天氣比較穩定；其中以 6~9 月為最熱，平均氣溫在 26~28°C 之間，平均最高溫皆超出 31°C。臺北市的極端最高氣溫，也就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氣溫，則為 38.6°C，約合華氏表 101.5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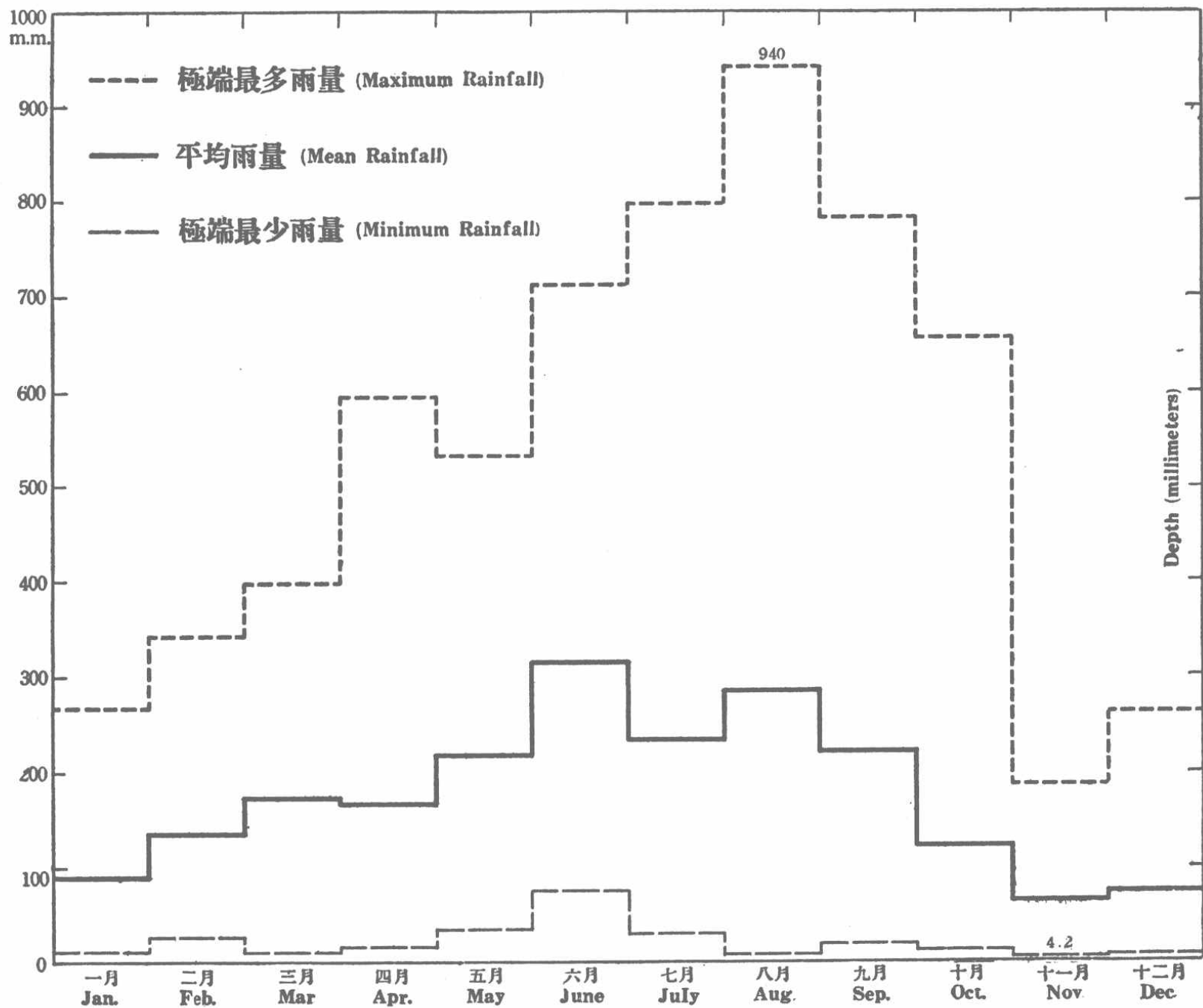


圖 3：臺北市之月平均與極端雨量，1897~1952 年之 56 年記錄

從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之間，每當連續陰雨之時，或大陸強烈寒潮南侵之際，臺北市的天氣偶亦相當涼冷；極端的最低氣溫，曾降至 -0.2°C ，或華氏表 31.6 度。在 1897~1956 年的六十年間，臺北曾見霜 34 次；惟最近二十年間，皆未見霜。氣溫的日較差，也就是白晝與夜間溫度之差，年平均為 7.7°C ；各月之中，以七月份為最大，得 8.9°C ，二月份最小，為 6.6°C 。

臺北市終年多雨，平均之年雨量達 2,101 公厘；最多的一年曾達 3,173 公厘，最少的一年也還有 1,499 公厘。全年除十一月、十二月與一月外，其餘九個月的平均雨量皆超過 100 公厘。從五月到九月，每月平均雨量皆在 200 公厘以上；六月是最多雨的月份，平均雨量達 316 公厘；十一月是最少雨的月份，平均雨量僅 64 公厘。

表 1：臺北市的氣溫與雨水，1897~1952

項 目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或 年平均
平均氣溫	15.2	15.0	17.1	20.7	24.2	26.6	28.2	28.0	26.4	23.1	20.0	16.9	21.8
極端最高溫	29.8	31.2	32.6	34.8	36.5	37.1	38.6	37.7	37.1	36.1	33.6	31.5	38.6
極端最低溫	2.1	-0.2	1.4	4.7	10.0	15.6	19.5	18.9	13.5	10.8	1.1	1.8	-0.2
極端最大較差	20.2	18.3	19.2	19.4	17.5	15.0	15.5	14.8	15.8	15.9	18.3	19.7	20.2
最高溫 $>30^{\circ}\text{C}$ 之日數	—	0.1	0.7	4.6	13.8	22.3	29.1	28.6	21.2	7.0	2.3	0.2	129.9
最低溫 $<10^{\circ}\text{C}$ 之日數	5.8	5.9	2.1	0.2	—	—	—	—	—	—	0.6	3.1	17.7
平均雨量(mm.)	90	136	174	168	219	316	234	285	221	122	64	74	2,101
最大日雨量	95.8	60.4	80.4	175.8	168.6	199.2	358.9	287.3	259.6	198.7	78.6	79.3	358.9
雨日數*	16.1	16.3	17.2	15.1	16.0	16.3	14.2	14.3	13.7	14.7	14.9	16.1	185
極端最多雨日	25	25	27	24	25	26	22	24	25	23	22	26	212
雷雨日數	0.4	0.8	2.3	2.9	3.3	7.4	8.7	7.6	3.6	0.6	0.2	0.1	37.9
極端最多雷雨日	4	4	8	10	10	17	19	16	11	4	3	1	67

* 降水達 0.1 公厘者。

資料來源：陳正祥著“臺灣省通志稿自然志氣候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55。

夏期當颱風過境，每有豪雨俱來。臺北市最大的日雨量，曾達 359 公厘；一小時內的最大雨量，曾達 88 公厘。隣近山地當豪雨之後，流經臺北盆地的河川常發洪水，而臺北的市街部分，海拔又低於新店溪與淡水河的最大洪水位⁽³⁾；故前當河堤未完成時，市內常患嚴重水災。1911 年 8 月底之颱風，曾使淡水河泛濫，臺北市街水深沒膝。1912 年八月 28~29 日的颱風，新店溪與淡水河同時暴漲，臺北市街盡成澤國，街道可以行舟，損失甚巨。

臺北市很少「快晴」的日子，能見度經常低；市民在一年之中，難得幾回看見大屯山的真面目。全年快晴的日數，合計不過 28 天；以九月份為最多，獨得 4.8 天；六月份為最少，祇有 0.8

註 3：據 1922~47 年間的記錄，淡水河在臺北橋之平均滿潮水位為 2.2 公尺，最大洪水位為 6.33 公尺；在環河南街之平均滿潮水位為 2.6 公尺，最大洪水位為 7.4 公尺。新店溪在溪洲橋之平均滿潮水位為 3.2 公尺，最大洪水位為 9.5 公尺。基隆河在中山橋之平均滿潮水位為 1.6 公尺，最大洪水位為 5.6 公尺。